

论文提要

《洪武南藏》法字第八、九函为唐代义忠撰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，此《疏》直至北宋初期仍大行于世，后代逐渐湮没无闻，发现《洪武南藏》之前、于神州故地实已散佚，得以保存至今确为万幸。不仅如此，《疏》本所附扉页版画亦极精致美观，最早研究《洪武南藏》的吕澂先生称其为“奘师译经图”，颇加赏赞。但自吕先生而后，虽不断有学者探讨《洪武南藏》各方面之问题，此幅版画却乏人问津。笔者不揣陋鄙，参考史料，对此图试行分析，发现其主旨绝非“译经”，本意在于展示中土法相三祖（玄奘、窥基、惠沼），换言之即慈恩一宗之“道统”，故将其重新定名为《法相三祖图》。进而结合其图、文构成形式，对文本作者潞府义忠之地位大胆推测，或在北宋初期并不低于今日习称之“法相四祖”濮阳智周。最后利用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（义忠故里）建封寺所存碑刻史料，论证在襄垣一带，自北宋之际就已存在对义忠的神化及崇拜，且延续至今，从而揭示出长期在藏外流传的《百法忠疏》，为何在金代被创刻自晋南的《赵城金藏》突然收入之原因（或由于此种地方信仰所致）。

关键词：《洪武南藏》 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 玄奘译经图 义忠 智周 建封寺

一、玄奘译经图

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太祖召集四方名僧于蒋山寺（灵谷寺）点校旧有经藏，此举或与刊刻新版大藏经有关。这是明代第一部官刻大藏，有“初刻”之谓，因开版于南京，故称“南藏”，为与接续其后的《永乐南藏》相区别，全称《洪武南藏》；洪武三十一年（建文元年己卯 1399），雕版接近完成，灵谷寺住持净戒（定岩净戒？～1418）奉敕重校禅籍数种入藏，续刻之；洪武三十四年（建文三年辛巳 1401），整部大藏刊版工毕，经版入藏京城南关天禧寺；永乐元年（1403）开放流通，可出资刷印；永乐二年（1404）修补经版（或因刷印造成木版磨损、或因“靖难之役”导致破损），但永乐六年（1408）僧人本性纵火焚寺，殃及池鱼，经版毁于一旦。此藏问世不久即遭焚毁，印刷成品存世极少，永乐十四年（1416），蜀献王朱椿（1371～1423）曾舍赐四川崇州凤栖山上古寺一部¹。1935年，南京支那内学院闻知此藏信息，恰逢同学院蒋唯心先生（？～1935）奔丧归蜀，便委其调查，但蒋氏不幸于途中罹难去世²。此后吕澂先生（1896～1989）亲自操刀撰写《南藏初刻考》³，首次对《洪武南藏》进行系统分析。1952年，上古寺将整部藏经移交四川省图书馆保存，现存 678 函，经折装，千字文函号自“天”（天地玄黄）至“鱼”（史鱼秉直），共约 7000 余卷。

《洪武南藏》部帙浩大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藏仅刊印三幅扉页版画，一属《佛说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》⁴、二属《大阿弥陀经》，均为宋、元之际《蹟砂藏》同经版画覆刻品⁵。最后一幅即“玄奘译经图”（图 1），属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（《洪武南藏》所收为二卷本，以下简称《百法忠疏》）。与上两图不同，此图及所属《百法忠疏》均不见于《蹟砂藏》，此《疏》作为入《藏》经目首次著录于元代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（编成于至元二十四年 1287，以下简称《至元录》）⁶，由于《至元录》相当于元代官版大藏经《弘法藏》之目录，故学者认为此部论疏是《弘法藏》本的覆刻，其扉画很可能也是《弘法藏》本扉画的仿刻品⁷。也就是说，“玄奘译经图”并非绘制于明初，而极有可能是元代作品。不过此处需注意，《百法忠疏》虽在元代首次被编入《至元录》经目，初次入《藏》或应在金代。蒋唯心先生遇难前，

¹ 关于《洪武南藏》雕印始末，自其被发现以来，至今仍无定论。甚至这一名称能否成立、即是否开雕于洪武年间亦已成为问题。如何梅老师发现此《藏》所收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八附有净戒所作刊记，或可证同《藏》刊版于建文年间，何梅文章出处见本注下文，原刊记可查《洪武南藏》精装本“誉”（驰誉丹青）八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八尾题，成都：四川省佛教协会，1999年，第210册340～341页。然本稿主旨非关此事，在仍无结论之当下，仅保守转引先学论述而已，行文中仍沿用《洪武南藏》之称谓。上文主要参考、综合如下论文：吕澂《南藏初刻考》，原载《内院杂刊》入蜀之作四，1938或39年。收录于黄夏年主编《民国时期佛教期刊文献集成》56卷，北京：中国书店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53～364页；何梅《明<初刻南藏>研究》，载《闽南佛学院学报》（现《闽南佛学》），2001年6月，第91～115页；野泽佳美《洪武南藏から永樂南藏へ》，载《駒澤史学（阿部肇一先生退職記念号）》第52期，1998年，218～239页；同氏《明初における“二つの南藏”》，载《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報》第45期，2007年，第15～23页。至于各先生文中意见相左之处，则不再转述。

² 按支那内学院时任院长欧阳竟无（1871～1944）所述，蒋氏死因为：“璧山（在重庆西）蒋唯心丁艰回璧，绑匪撕票而亡。”见《宋藏遗珍叙目》欧阳竟无《序》，北京：三时学社，1935年；同氏《得初刻南藏记》所述更为详细：“（蒋唯心）探《南藏》，途次盗掠之，中夜窃遁，盗觉而害之。”载《欧阳竟无佛学文选》（麻天祥主编《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》）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88页。此文原载《内院杂刊》入蜀之作四，1938或39年。收录于黄夏年主编《民国时期佛教期刊文献集成》56卷，第351～352页。众所周知，蒋唯心也是较早实地勘察山西省广胜寺的重要学者之一。1933年范成法师（1884～1958）发现广胜下寺藏有大量古代经卷，即此后闻名于世的《赵城金藏》，1934年秋，蒋唯心专程赴晋考察，借宿于广胜上寺（其时《金藏》已搬运至此），阅藏四十余日，后在同学院吕澂先生指示下，于同年撰写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一文，欧阳竟无题名，论证精审，时至今日仍为研究《金藏》所必读。

³ 吕澂《南藏初刻考》，按同刊同期，吕先生文后又有释德潜《检阅崇庆古寺明藏记》一文。如此则蒋唯心罹难后，内学院似又委德潜调查《南藏》。

⁴ 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32册同经经题有所不同，为《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偈颂》。高南顺次郎等编，东京：一切经刊行会，1924～1934年。

⁵ 按吕澂先生考证，“《初刻》经、律、论五百余函，皆覆《蹟砂》版……卷帙次第乃至错简衍文，皆一一吻合。……然非谓其覆而尽肖也，《蹟砂》经题省略，《初刻》即随处划补，痕迹显然。”可见《洪武南藏》与《蹟砂藏》关系紧密。但同时也参考了北传《大藏经》体系，“编次取材北地，微有损益焉。”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即为一例，吕澂先生谓：“……法八、九编入义忠《百法论疏》二卷，皆北地流行而《蹟砂》未收者”。见《南藏初刻考》，第355～358页。

⁶ 收于“兹”（务兹稼穡）字帙，已分为二卷。见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卷十，载《昭和法宝总目录》卷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75年，第237页。

⁷ 见何梅《明<初刻南藏>研究》。

1934 年秋曾实地勘察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所藏《金藏》（见前页注 2），于名著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中首次论证所谓《弘法藏》应为《金藏》在元代之补刻，吕澂、宿白（1922~2018）诸先生亦加以肯定⁸，而《百法忠疏》也是在雕印《金藏》时首次被收入大藏的⁹，这就意味着此幅版画的祖本很有可能上溯至金代。

此《疏》自《洪武南藏》后再未入《藏》，在《洪武南藏》被发现前，于国内已成佚籍。但在历史上却影响颇巨，《宋高僧传》作者赞宁盛赞曰：“（义忠）《百法论疏》最为要当……于今盛行勿过忠本。”¹⁰可见直至北宋初年赞宁作传之际，《百法忠疏》仍十分流行，有可能一直以单行本形式在《藏》外流传。《宋史》艺文志即著录：“忠师《百法明门论疏》二卷”¹¹。另外，此《疏》在唐代就已东传扶桑，如日僧圆仁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》载：“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一卷，沙门义忠撰。”其师弟圆珍入唐亦曾求得，见《智证大师请来目录》：“《百法论疏》一卷，北忠。”¹²但两则著录信息与《宋史》及《洪武南藏》本分卷不同，据传日本现存镰仓时期古抄本¹³。四川省佛教协会于 1999 年将《洪武南藏》全部影印出版，以惠学人，《百法忠疏》收于第 205 册¹⁴。

二、画面简介

吕澂先生最早提及此图，在《南藏初刻考》一文中称之为“奘师译经图”，此后这一名称被沿袭至今，只将“奘师”改为“玄奘”。

画面中共有三位坐姿人物，均附小字榜题。居中而坐者两侧各有榜题一则，分别为“三藏法师”（人物左侧）及“奉诏翻译”（人物右侧），可明中心人物为玄奘（602~664），奘师所翻佛典，经题之下多附“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”一句，榜题或源于此。奘师身后立一屏风，中绘山水，身前横置几案（榻足案），案上自左至右（观者角度）陈列砚台、墨棒、笔格（插裸笔一支）、铺展之纸张、镇尺、纸张前条形物品、经函，几案台面之上铺陈素面方巾，一角悬垂于案前。其下另铺设一重方形物，边框饰忍冬纹，框内空间点缀圆形纹样四颗。奘师坐于案后，方面大耳、慈眉善目，头部稍向右倾，目光注视右下，右手执笔蘸墨，左手抚案；外披袈裟、内着僧袍，僧袍衣领及袈裟田相条纹均为黑色。

玄奘左侧人物斜上有榜题“慈恩疏主”，可知此人为奘师高足“慈恩法师”大乘基（习称“窥基”632~682），因著述丰赡，又称“百本疏主”，榜题实将二号合一。基师正襟危坐，面露微笑、直视前方（以观者角度视，注视画面左侧），左手抚膝、右手执笔当胸，穿着同于奘师，只袈裟田相中未饰点状虚线；身前、身后亦置条案及山水屏风，案上亦陈纸、墨、笔、砚、镇尺等文具，笔架斜倚毛笔一支，下侧案头平置捆扎状纸张三卷。与奘师案上陈设相较，笔格变为笔架、不见经函，规格似有所降低。

⁸ 吕澂《金刻藏经》，载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卷三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1 年，第 1441~1446 页；宿白《赵城金藏和弘法藏》，载《现代佛学》，1964 年第 2 期，13~22 页；后改题为《赵城金藏、弘法藏和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大藏残本》，收入《藏传佛教寺院考古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222~233 页。

⁹ 蒋唯心曾依据《赵城金藏》现存经卷对照《高丽藏》及《至元录》复原《金藏》简目，《百法忠疏》在“稷”（我艺黍稷）字帙。可惜的是《赵城金藏》中的《百法忠疏》已经亡佚，无法与《洪武南藏》同书比对。见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附《广胜寺大藏经简目》，南京：金陵刻经处，1935 年，第 34 页。

¹⁰ 宋·赞宁撰，范祥雍点校《宋高僧传》卷四《唐京兆大慈恩寺义忠传》：“（义忠）《百法论疏》最为要当……于今盛行勿过忠本。”载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·宋高僧传》册（全二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 年，第 77 页。

¹¹ 元·脱脱等撰《宋史》艺文志（卷二百五、志第一百五十八、艺文四）：“忠师《百法明门论疏》二卷。”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 5182 页。

¹² 圆仁与圆珍两则记录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 55 册，第 1083 页下栏及 1105 页下栏。

¹³ 据野泽佳美著《明代大藏经史的研究—南藏の歴史学的基础研究》（东京：汲古书院，1998 年）转述，日本金泽文库（神奈川县）及天津西教寺（滋贺县）现存《百法忠疏》镰仓时期抄本，见同书第一章注 36 转引日置孝彦《金沢文库保管<大乘百法明門論疏>について》一文（此文笔者尚未拜读），第 63 页。另，同书同章注 41（第 64 页）谓北宋·王尧臣等编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宋史》艺文志均著录《百法忠疏》。查王云五主编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《崇文总目》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 年），卷四（原卷五十四）录文如下：“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二卷”（第 313 页），并未著录作者，谨慎起见，似不能肯定即为义忠所著，因玄奘弟子大乘光（普光 627~683）亦撰有同名论疏二卷；《宋史》则十分明确，可确认为忠本，见上注。

¹⁴ 《百法忠疏》收于同册第 231~291 页，此版印制精良，但“玄奘译经图”所占版面过小，并不清晰。且整部藏经中历代重要题记多未印出，堪称白璧微瑕。另，此前北京版《中华大藏经》亦曾影印《洪武南藏》之《百法忠疏》，然扉页版画模糊不清、全无参考价值，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《中华大藏经》（汉文部分）第 100 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6 年，第 218~238 页。

樊师右侧、与基师相向而坐者榜题“惠沼法师”。惠沼（648～714），基师高徒、樊师再传，又作“慧沼”、“惠照”，一说原名“玄”、避师讳改称“沼”¹⁵。俗姓刘，本籍彭城，后迁淄州（今山东省淄博市），号“淄州沼”。沼师衣着及周边陈设同于基师，但姿态颇为灵动，右手执笔高扬，左臂回护右臂衣袖，目光注视案上纸张，似有所悟，法喜非常，正欲提笔书写。

三人呈“品”字形排列，“品”字正中，即画面中部偏下，有一硕大莲台，其上再安置小型莲台，形状有类博山炉，顶部山形之中散出七条曲线，指向樊师者三条，基师、沼师者各二，似表缭绕之香烟，此处权且称其为香炉。香炉之下铺设方毯，其中圆形纹样有似樊师案前悬垂者。香炉两侧净瓶各一，分插莲华各四。画面空余处亦有装饰，地面为习见之杂宝纹，空中则天花散落，左右各三。

画面中除榜题“奉诏翻译”外，也确有表现译经之处。樊师案上纸张上侧、镇尺之前有一长方形条状物，内有类似鸟足痕迹的不规则纹样，此物实为梵本，即天竺佛典载体“贝叶经”（图2），鸟爪之迹，或源于画师不知梵文状貌，只得以模棱两可之纹样替代。此图榜题完整，人物身份明晰，刻印精致；图中青莲吐蕊、紫烟缭绕，天雨香花、地涌杂宝，樊师案前贝叶横陈，胸有成竹，方欲转梵为汉，再弘能仁妙典，两侧窥基、慧沼佐助翻经，整幅画面和谐稳妥，概观之下似无所谓“问题”，然果真如此否？

三、《百法论》翻译时代及画作疑点

此图为扉页，必与所属经卷有所关联，后续文本即为《百法忠疏》，那么图中所译者最有可能是《大乘百法明门论》（Mahāyāna śatadharma prakāśamukha śāstra）¹⁶，此论世亲菩萨（Vasubandhu）¹⁷造，由《瑜伽师地论》（Yogācārabhūmi śāstra）“本地分”六百六十余法中略出一百法，释“一切法无我”，明“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”，是深入学习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（Yogācāra 大乘有宗）理论的基础论典之一。

然而，樊师翻译此《论》之年份，却与本图内容存在矛盾。至于具体时日、译场地点，史料中又有两种不同记载，其间相差一年。一为唐·道宣（596～667）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六：“《百法明门论》（二纸）……贞观二十一年（647）玄奘从驾于翠微宫内译。”¹⁸一为唐·慧立（615～？）撰、彦惊笺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（下简称《三藏法师传》）卷七：“（贞观二十二年 648）冬十月，车驾还京，法师亦从还。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微殿西别营一所，号弘法院，既到，居之。昼则帝留谈说、夜乃还院翻经，更译……《百法明门论》一卷。”¹⁹

按终南山翠微宫，唐高祖始建，原名太和宫。贞观十年（636）改龙田寺，贞观二十一年命阎立德重修，仅九日工毕，改名翠微，同年五月驾临，秋七月归京²⁰。两年后的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五月，太宗崩于此宫含风殿；北阙，太宗晚年于长安所营宫室，大体位于大明宫范围之内。紫微殿为北阙殿宇之一，贞观二十二年已建成，同年曾于此殿设宴庆贺攻破

¹⁵ 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44册所收惠沼集《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》卷末，日僧信西于土御门天皇正治二年（1200）所作题记，谓：“有记云，纂主大诤惠玄，为忌三藏改为惠沼，云云。”或非空穴来风，唐·李邕（678～747）撰《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惠沼神塔碑》载：“和上讳玄，字惠沼”，上引日僧所记或由此演绎而来。《神塔碑》载《记续藏经》第150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93年，第0180页。

¹⁶ 此《论》副题为“本事分中略录名数”。

¹⁷ 音译婆薮盘豆、婆修盘陀、伐苏畔度，意译天亲、世亲。

¹⁸ 唐·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六，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55册，第296页上栏。

¹⁹ 唐·慧立撰、彦惊笺，孙毓棠、谢方点校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七。载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·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、释迦方志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154页。

²⁰ 翠微宫遗址在西安市南27公里长安县滦镇皇峪寺村山间台地之上。北宋·王溥撰《唐会要》卷三十“太和宫”条：“武德八年（625）四月二十一日，造太和宫于终南山。贞观十年废，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……遣将作大匠阎立德……包山为苑……九日而毕功，因改为翠微宫。”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550页。北宋·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八：“（贞观二十一年）夏，四月，乙丑，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。……五月，戊子，上幸翠微宫。……七月，庚戌，车驾还宫。”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6246及6248页。另据詹宗祐考证，贞观十年并未废弃太和宫，而是改为龙田寺，故阎立德仅用九日即完工，今从之。见《新唐书纠谬二则》，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第4期，2007年7月，第34～35页。此外，《全唐诗》第一册录太宗《秋日翠微宫》一首，应即贞观二十一年所作，因其后太宗再未于秋日居翠微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4页。

龟兹。学者推测此殿在高宗改建大明宫后改称紫宸殿，系内朝主殿，与外朝含元殿遥相呼应。其遗址西侧有一较大院落，今标为延英殿院，或即当年之弘法院²¹。

翻译《百法论》年代、场所的两则记录，均出自与玄奘同时代、且关系密切之人，道宣律师自不待言，慧立曾参加玄奘译场，彦惊亦为奘师弟子，孰是孰非，令人难以致辞。饶有兴味的是，稍后武周时期的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采用道宣观点²²，影响巨大的《开元释教录》沿用《三藏法师传》的说法²³，可见此问题即便在相隔不远的盛唐时期亦已模糊不清。但《开元释教录》向以精审著称，作者智升专精毗尼，却并未盲从宣律师所记，想来必有所本。今据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一、时任译场监阅、银青光禄大夫许敬宗（592~672）所作《后序》，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，奘师于弘福寺（后改兴福寺，在长安修德坊）“肇译《瑜伽师地论》²⁴”，恰恰就在同月，太宗移驾翠微，可知玄奘忙于翻经，至少此时并未从驾。而太宗本年仅居翠微两月，七月即还，《瑜伽师地论》一百卷，耗时整年，次年同月同日方告完成，其间玄奘是否曾赴翠微面君，无法确证；再则，智升所记《百法论》出经日期（十一月十七日）又恰在《瑜伽师地论》译成（五月十五日绝笔）半年之后，《百法论》为《瑜伽师地论》之略出，篇幅短小，以理推之，此种先繁后简、先整体再局部的翻译顺序或更为合理有效，故笔者更为认同《三藏法师传》及《开元释教录》所记时日，即《百法明门论》译于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²⁵。

但是，若就此年代而论，版画中窥基、惠沼均不应存在（即便采信贞观二十一年之时点，结果亦相同）。据《宋高僧传》卷四《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》所述：“（窥基）至年十七遂预缁林，及乎入法，奉勅为奘师弟子……年二十五应诏译经。²⁶”基师五十一岁圆寂，时为永淳元年（682），由此逆推，应召翻经当在显庆元年（656），复上推，出家之时正为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。如此当可明确，奘师翻译《百法明门论》之年，窥基始入佛门，少年沙弥年方十七，日后虽为法门龙象，然此时恐怕熟习内典尚自不暇，遑论翻经？而淄州沼法师，此年方始降生，婴儿赤子，更可无视。事实上，慧沼从未参与玄奘译场，武后时期确曾协助义净（635~713）翻经。换言之，此图并非翻译《百法明门论》之场景，最为重要的是，无论奘师翻译何种经典，就实际情况而视，此三人均不可能同坐于一处。

再则，玄奘万里西游，回归故国，太宗戎马倥偬之际（“问罪辽滨”），对翻经之事仍重视有加。以初次翻经之弘福寺译场为例，特委留守梁国公房玄龄（579~648）亲自协助（“诸有所须，一共玄龄平章”），所需均由官方承担（“依所须供给，务使周备”），又不惜以国家之力召选全国高僧参与，计有证义十二人、缀文九人、字学一人、证梵语梵文一人，其中来自长安地区十三人，蒲州三人，廓、汴、绵、益、简、幽、洛七州各一人，仅核心人员就有二十三人之众²⁷，唐初佛教精英可谓尽聚于此，译成后随即进呈御览。此种宏大规模，在本幅版画中全无体现，若与另一幅著名版画《西夏译经图》相较（图3），更可一目了然。《西夏译经图》为《现在贤劫千佛名经》（西夏文）卷首扉页，表现西夏政权官办译场翻经景象。

²¹ 详情可参照高本宪、高永丽《唐太宗“大营北阙”考》，载《文博》，2006年第7期，第55~58页。

²² 武周·则天敕修、明佺等撰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卷六：“《百法明门论》一卷（两纸），右唐贞观二十一年三藏玄奘从驾于翠微宫译，出《内典录》。”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55册，第0407页中栏。

²³ 唐·智升撰，富世平点校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八（第二册）：“《大乘百法明门论》一卷，见《内典录》，世亲菩萨造，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阙弘法院译、沙门玄忠笔受。”载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·开元释教录》册（全四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8年，第496页。在“二十二年”后点校者加注曰：“《清藏》、《四库》本作‘二十一’。”（《清藏》本指乾隆版《大藏经》），然正文并未改动，或可见点校者对此问题之态度。

²⁴ 唐·许敬宗撰《（瑜伽师地论）》《后序》：“至（贞观）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，肇译《瑜伽师地论》……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绝笔，总成一百卷。”见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一，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30册，第0283页上栏。

²⁵ 一直有学者认为当尊从道宣观点，且《百法论》是否略自《瑜伽师地论》、作者是否世亲亦应检讨。然此问题非关本稿主旨，故不作展开。最新考证可参见张磊《〈大乘百法明门论〉的翻译与内容来源新考》，载《宗教学研究》，2018年第3期，第108~115页。

²⁶ 《宋高僧传》卷四《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》：“至年十七遂预缁林，及乎入法，奉勅为奘师弟子……年二十五应诏译经……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，至十一月十三日，长往于慈恩寺翻经院，春秋五十一。”第64页。窥基自著《成唯识论掌中要》卷上自述：“至年十七遂预缁林”，故出家年龄应无疑义。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43册，第0607页下栏。

²⁷ 参见王亚荣《长安佛教史论》“玄奘译场助译僧考述”，载《宝庆讲寺丛书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87~206页。

主译者白智光高座居中，助译僧俗排列两侧，左右各八人，共计一十六人；下侧更有“盛明皇帝”（夏惠宗）及“母梁氏皇太后”相向而坐，手执供器，虔诚随喜²⁸。若“玄奘译经图”意在宣扬奘师译经盛况，何以仅绘区区三人？故可明了，此图绝非表现译经场景，画面主题实则另有所在²⁹。

四、画面主旨及图像分析

《宋高僧传》于《窥基传》末盛赞曰：“奘师为瑜伽、唯识开创之祖，基乃守文述作之宗，唯祖与宗，百世不除之祀也。”³⁰此即“玄奘译经图”主旨：法统传承、师资血脉是也。图中玄奘、窥基、惠沼三师，实为中土法相三祖。

奘师一生事迹，简而言之，不外取经、翻译、佛学三项：师轻生殉法、中开王路，携归贝叶五百二十夹、总六百五十七部³¹；季羨林（1911~2009）先生谓：“从隋初（581）至唐贞元五年（789）共二百零八年，译人五十四、译经四百九十二部、二千七百一十三卷。玄奘一个人就译了七十五部、一千三百三十一卷³²”；以此为基础，将印度瑜伽行派引入中国，为法相宗（慈恩宗、唯识宗）奠定了理论体系³³。窥基上承奘师余烈，“创意留心、勤勤著述……造《疏》计可百本。”大宏法相唯识之学，后世谓慈恩一宗实成于基师，下则抚育贤才，得淄州惠沼，以传宗旨；沼法师亲承慈恩言教，远接奘师神髓，华章溢彩、辩难激扬、传译不倦、行化诸郡，致有谚曰“河南照天下³⁴”，真无愧乃祖乃师，法相至此全盛矣；诚如梅光羲（1878~1947）所谓：“大唐初运，有玄奘三藏，远涉天竺，亲谒戒贤……此是震旦法相始祖；……次有窥基法师，是三藏上足……时称百部疏主……号为慈恩大师；次有淄州慧沼大师，继于慈恩，盛敷此宗。”³⁵

细审版画，画面构图与内容也无不围绕“法相三祖”这一主题展开。三师坐次，始祖（玄奘）居中、左昭（窥基）而右穆（惠沼）；三人形体，奘师最为高大，窥基次之，惠沼最小；三座屏风体积亦然，且奘师屏风所绘山水雄壮、峰峦叠嶂，窥基、惠沼身后屏风大小相若，唯汀洲树石而已；以上种种均在体现奘师之地位，有若耸峙之高峰，不可摇撼。奘师案前置一硕大香炉，烟气缭绕、馨香四溢，而基、惠二师案前仅为净瓶；窥基一侧净瓶中四朵莲华有三朵全部绽放，惠沼一侧含苞待展、无一开放；似暗喻玄奘一代宗师，法流四远、熏习后学，窥基学业已成、使慈恩一宗大放异彩，惠沼后起之秀，虽才华横溢、却有待大成之日。

再则，居中之香炉及两侧生发莲华之净瓶，正可构成“一炉二瓶”即“三供”的配置，更加彰显此图“供养祖师”之意味。就常见的瓷器“三供”而言，学者多认为成熟于元代，但以理推之，陶瓷器而外，寺院中瓶、炉供器组合形式似应更早成形³⁶。总之，这亦可作为考察本图祖本时代的线索之一。

回至画面，玄奘、窥基神态安详，细观之，二人目光均在注视惠沼，面带微笑，如长辈

²⁸ 此图原藏北京图书馆，周叔迦先生（1899~1970）最早著录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，纵、横均约 27cm，详情可参见史金波《〈西夏译经图〉解》，载《文献》，1979 年第 1 期，第 215~229 页。

²⁹ 本段括号中玄奘事迹引文均出自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六，第 129~131 页。

³⁰ 《宋高僧传》卷四《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》：“系曰：性相义门，至唐方见大备也。奘师为瑜伽、唯识开创之祖，基乃守文述作之宗，唯祖与宗，百世不除之祀也。……二师立功与言，俱不朽也。”第 66 页。

³¹ 见季羨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二，载《中华交通史籍丛刊·大唐西域记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 年，第 1041 页。

³² 季羨林《玄奘与〈大唐西域记〉》一校注《大唐西域记》前言，载季羨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记》，第 12 页。另，“一千三百三十一卷”这一数字季先生在脚注中明言依据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》，但查《行状》，应为“合翻梵本七十五部，译为唐言，总一千三百四十一卷。”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 50 册，第 0220 页上栏。此外，这一数字几种文献略有差别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记为：“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，总一千三百三十八卷。”唐·靖迈撰《古今译经图纪》卷四谓：“除《西域记》总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”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 55 册，第 0367 页下栏。

³³ 如法相宗“六经十一论”，奘师独自翻译了其中一经七论。

³⁴ 唐·李邕撰《唐故白马寺主译惠沼神塔碑》，载《卮言补遗》第 150 册，第 0180 页。

³⁵ 梅光羲《相宗纲要正续合编》“法相宗名”条，上海：佛学书局，1921 年，第 8 页。

³⁶ 入宋日僧绘于南宋末期的《五山十刹图》中即可见一炉二瓶组成之“三供”，也可见一炉二瓶二烛台的“五供”。当然，《五山十刹图》版本复杂，祖本亦不存，传写过程中难免产生讹误，于此只作参考。可参看张十庆著《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》，南京：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00 年。如图 2-2《径山寺僧堂平面》（118 页）、图 2-3《灵隐寺僧堂平面》（119 页），图 2-5《金山寺众寮平面》（121 页）等图，中央供案之上均陈设三供。

面对儿孙，慈爱关怀之情自然流露；惠沼手舞足蹈，似突然发明宗意，急欲宣说，二位长者停笔不书，似欲聆听后辈之高论，又似对其成长甚为欣喜；此种人物神态与动态的细微刻划，不仅更加深了“法统传承、师资血脉”这一主题，也暗含法相宗“人才代有”之寓意。且玄奘与窥基之眼神朝向，顺应开卷方向，不觉之中将观者目光向惠沼处引导，而惠沼身后，即为文本之开端，由图入文，过渡自然流畅。吕澂先生曾评论此图：“颇有法度，殆亦慈宗传本也。”³⁷所谓“法度”盖指此乎？至此，或可将“玄奘译经图”改称“法相三祖图”（图4）。

五、画外第四人

自北魏沙门统昙曜在云冈与吉迦夜（Kivkara）共译（或为曜师编辑）《付法藏因缘传》以降，中土佛教莫不重“法统”二字。法相一宗，直承印土瑜伽行派，由弥勒菩萨（Maitreya）、无著菩萨（Asanga）、世亲菩萨（Vasubandhu）开创，经陈那（Dignāga）、护法（Dharmapāla）、戒贤（Śīlabhadra）诸大论师而至玄奘，再传窥基、惠沼，与本土诸宗相较，脉络明晰、法统最为纯正，本幅版画为何又要强调慈恩法脉之传承呢？

笔者认为此有广、狭二意。狭者仅就此图而论，除图中三位祖师之外，尚有画外第四人，即文本作者潞府沙门义忠。义忠，俗姓尹，晋南襄垣（今山西省长治市属县）人。九岁薙染，入惠沼门下，年少聪慧，号“空门奇童”，著述繁多，讲学不辍，“四方美誉、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。”³⁸所撰《百法忠疏》在北宋初年仍大行于世。如上所述，画面中三祖惠沼位于最左侧，观者顺奘师、基师注视方向浏览至惠沼，顺行向左，即可自然过渡至文本，义忠以文本形式接续于乃师图像之后，在强调法统传承的同时，又使扉页版画与后续文本完美呼应、紧密结合，图文浑然一体，不可分割，此为构图搭配巧妙之所在。所谓广者，即由此而来。本幅版画与文本结合所体现之法相谱系，应为玄奘→窥基→惠沼→义忠。然众所周知，时至今日，论慈恩一宗师资血脉，惠沼之后，实以濮阳智周（678～733）为四祖。智周亦为惠沼高足，俗姓徐，二十三岁拜入师门，曾住濮阳（今河南省濮阳市）报城寺，著述等身，世称“濮阳大师”。或可谓，版画及文本如此衔接，无非强调义忠所学其来有自，未有他意。但细思之，恐存另一种可能。

传世不多的智周资料中，唐代昙旷于大历年间（766～779）所撰《大乘入道次第开决》十分重要，其中谓：“大唐开元初有濮阳大德、身号智周，我大唐三藏曾孙弟子，慈恩大师之孙弟子，河南法师之亲弟子，即是青龙大师异方同学。”³⁹“河南法师”即惠沼，“青龙大师”，杨维中先生认为此人就是为唐玄宗《御注金刚经》撰写《宣演》的道甑（668～740）⁴⁰，其人精通法相唯识，极有可能曾从惠沼受学，住长安青龙寺，故此《宣演》世称“青龙疏”⁴¹。细嚼昙旷文意，明确智周所属法脉后，反有借“青龙大师”抬高智周地位之嫌。且，今日所谓四祖智周，《宋高僧传》竟然未予立传，《惠沼传》之后为彦惊（《三藏法师传》整理者）、次为新罗华严义湘、再次便为潞府义忠。同书《义忠传》又言：“况基师正照于太阳，忠也旁衡于龙烛。”⁴²甚至将义忠与窥基对照，可见义忠在作者赞宁心中之地位。“巧合”的是，本幅版画所属《百法忠疏》，开篇即为窥基序言，不过细读此《序》，实为《百法明门论》解题，似不见于他处，当然无法肯定即为窥基所作，与义忠文本之关系亦不清晰。但查唐·从

³⁷ 吕澂《南藏初刻考》，第358页。

³⁸ 《宋高僧传》卷四《唐京兆大慈恩寺义忠传》：“沼授与《大涅槃经》，时十三岁矣。相次诵彻四十卷，众皆惊骇，号空门奇童也。……况基师正照于太阳，忠也旁衡于龙烛，四方美誉，千里归心者，不可胜算矣。”第77页。

³⁹ 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85册，第1206页下栏。此文原为敦煌遗书之一，诸本编号分别为：S.2463v、S.6915、P.2202v、北8705（官065），见敦煌研究院编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索引第25页。

⁴⁰ 杨维中撰《中国唯识宗通史》，载《凤凰文库·宗教研究系列》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下册第810页。

⁴¹ 《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》（《金刚般若宣演》），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85册。此文《赵城金藏》收于“庭”（钜野洞庭）字帙，但仅存第五卷，他藏未入。敦煌遗书亦存，编号P.2132、P.2173。除此之外，代宗朝青龙寺良贲（717～777）奉敕所作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》（《新译仁王经疏》）亦称“青龙疏”，但良贲出生时惠沼已圆寂，应非其弟子。禅宗祖师德山宣鉴（782～865）亦曾作《青龙疏钞》，并携此《钞》参龙潭崇信禅师。悟道后当众焚之，宗下对此津津乐道，反复提及。

⁴² 出处见本页注38。

方（芳）撰《百法论显幽钞》⁴³，将此《序》与义忠《疏》文一并阐释，且针对《序》中“然以怀生莫感、歼我法雄。”一句的“我”字，明确解释道：“我者，即是慈恩和上自称言我。”⁴⁴可证唐代《百法忠疏》文本已具此《序》，署名与今本相同，亦为基师⁴⁵。然而，若谓上引《宋高僧传》盛赞义忠（与窥基并提）、无视智周纯为赞宁一家之态度，那么在本图所属文本之前配以基师《序言》，此种“巧合”，又是否反映出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对法相宗传承脉络的某种共识呢？

六、法相四祖及建封古寺

神州相宗至惠沼后即行衰落，师资亦渐行模糊，元后更是章疏散佚，研习无门、复兴无望。相形之下，东瀛扶桑却直绍盛唐，传承有序，其接点即在濮阳智周。智周门下有新罗智凰、智鸾、智雄，此三人东渡弘法，又有日僧玄昉（亦作昉？～746），开元四年（灵龟二年716）入唐师从智周，直至开元二十二年（天平六年734）智周圆寂方才归国，开创日本法相宗“兴福寺传（北寺传）”一派，得天皇赐紫，影响极大，故智周实为东瀛慈宗重要宗祖。后世日本佛教，或因此以智周为法相四祖，如奈良东大寺华严宗僧凝然（1240～1321）所著《八宗纲要》便如此排列（玄奘→窥基→惠沼→智周）⁴⁶。

而清末以来，我国法相唯识之学所以突显复兴之势，实由杨仁山居士（1837～1911）东瀛访书，得法相章疏回国大力弘传所致。关于我国宗派分流及法相传承，仁山居士一依日僧凝然之观点，居士曾著《十宗略说》，开篇谓：“顷见日本凝然上人著《八宗纲要》，引证详明，而非初学所能领会，因不揣固陋，重作《十宗略说》，求其简而易晓也。”后文明记：“唐之玄奘……归国译传，是为慈恩宗，窥基、慧沼、智周，次第相承。”⁴⁷居士传人欧阳竟无、吕澂二先生自无异说，上文所引梅光羲文句也明显参考凝然所述，而梅先生亦仁山居士入室弟子。汤用彤先生（1893～1964）虽曾著《论中国佛教无十宗》一文破斥之，然对慈宗传承未遑论及，此后辗转承袭，致为定论。今日结合版画及《宋高僧传》重行审视，笔者愚鲁，大胆叵测，至少在赞宁作《传》的北宋初期，我国对于法相四祖为何人或无定论，某种情况之下，义忠甚至更占上风。

前文有述，本幅版画祖本或可上溯至金代，即雕印《赵城金藏》之际。《金藏》由民女

⁴³ 此《钞》专为注释《百法忠疏》而作，收于《正续藏经》第48册。残本，原本十卷，仅存三卷未满（第一、二、七残卷），第二、第七卷文末有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）法隆寺别当、日本法相宗僧佐伯定胤（1867～1952）题记，简述残本内容及来历。本《钞》在圆仁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》中已著录，题为“《百法论显幽钞》十卷 沙门从方述”，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55册，第1078页下栏。永超编《东域传灯目录》著录为“《显幽钞》十卷 古总持寺沙门从芳释《游府记》”，“《游府记》”应指《百法忠疏》，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55册，第1157页下栏。

⁴⁴ 《正续藏经》第48册《百法论显幽钞》第一卷末，第0231页上栏。且此卷末尾又言：“□□□□序讫也。”文字虽残，结合前文《钞》前文，可明确第一卷全为解释《百法忠疏》序言之文。

⁴⁵ 或谓，《宋高僧传》载义忠亦住大慈恩寺，焉知《显幽钞》之“慈恩和上”非指义忠而言？若如此，则《百法忠疏》序文或应为义忠自撰，后人妄附基师名讳。然，此处之“慈恩和上”实指窥基。《显幽钞》同卷下文亦有此四字：“即慈恩和上叹云：晦孤明于《俱舍》……”查“晦孤明于《俱舍》”语出基师《成唯识论述记》卷一，故可知同文中“慈恩和上”均应指窥基。且历代文献中“慈恩和上”或“慈恩和尚”多为基师代称，此不赘言。

⁴⁶ 日本·凝然《八宗纲要》：“次大唐初运有玄奘三藏……是大唐法相始祖、天竺相承第六也。……次有窥基法师……继于三藏广传此宗。……次有淄州惠沼大师，继于慈恩大师盛敷此宗……次有濮阳智周大师，禀于淄州大师广传此宗，此并大唐国相承次第也。”载日本·黑田真洞注《标注八宗纲要》下册，京都：出云寺书铺，明治十九年（1886），法相宗条。另，蓝吉富主编《大藏经补编》第32册（台北：华宇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收有日本龙谷大学编《讲本八宗纲要钞》，相同文句在第51页。

同时也应注意，凝然在其他著述中梳理中国法相谱系时，对义忠均有提及，与《八宗纲要》所记微有区别。如《内典尘露章》法相宗条：“玄奘三藏……昌弘此宗，门徒三千，达者七十，……入室一般唯推基公；基师之门，有淄州慧沼；沼公之下，有濮阳智周、潞府义忠，大唐法相如此相承。”载《大藏经补编》第32册，第0530页下栏；又如《三国佛法传通缘起》卷上，法相宗条：“玄奘三藏从西天还……百本疏主目放神光、口流辩河；淄州、濮阳，继踵敷教；义忠、如理，并肩立义……后代连踵不绝，永世履踪无废。”载《大藏经补编》第32册，第0653页中栏；再如《五教章通路记》：“玄奘是震旦国法相始祖，次慈恩大师，次淄州惠沼大师（笔者：按同书校注，应为淄州惠沼），次朴杨智周大师（笔者：应为濮阳智周）、及路符义忠（笔者：应为潞府义忠）等也，震旦血脉，自此已后，不知所录。”载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72册，第2339页下栏。上引三条之间实亦有所抵牾，然非关本稿，于此不作讨论。

⁴⁷ 见《杨仁山居士遗著》第四册《十宗略说》，南京：金陵刻经处，1917年，开篇及慈恩宗条（第124、131页）。仁山居士于凝然所分八宗（俱舍、成实、律、慈恩、三论、天台、华严、真言）之上加入禅、净二宗，重排次序，演为十宗。

此外，《八宗纲要》对《十宗略说》之影响及关系，可参见陈继东《コメント：隋唐時代の東アジア仏教における宗派意識の問題点：凝然撰『八宗綱要』と楊文会撰『十宗略説』の視座を通して》一文，载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《東洋文化研究》第10号“特集：隋唐期東アジア仏教の宗派意識”（2008年），第507～516页。

崔法珍“断臂明志”发起募刻，助缘者主要为晋南、秦西百姓⁴⁸。所堪注意者，法珍出身晋南潞州（今山西省长治市），此处正是义忠桑梓之地（潞府襄垣人，今长治市襄垣县）。《宋高僧传》载义忠七十二岁返回“昭义”（唐代昭义军曾统辖此地）、即故乡潞州专心诵戒行道，“每一坐时，面向西北，仰视兜率天官，冥心内院。”最终安然往生兜率，肉身不腐，乡人起塔供养⁴⁹，颇具神异色彩。

今日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有建封寺存留⁵⁰，又名“百法院”，寺西 50 余米有所谓“百法疏主和尚灵塔”（建封寺塔），体量小巧，有类经幢。据当地传说，此寺即义忠晚年居住、圆寂之处。同寺所藏明孝宗弘治元年（1488）刘凤仪⁵¹撰《重修建封寺正殿记》谓：“（襄垣）县之东南三里许，有寺曰建封，乃唐百法上人超凡入圣之所。⁵²”又有弘治七年（1494）寺僧所作《谨录百法疏主和尚行状》刻石一块，所记杂抄《宋高僧传》，然年代讹误，荒乱不经，无可参考⁵³。但据此可知，明代当地僧俗仍知“百法疏主”或《百法忠疏》（仅及名号，已无所谓研习），可见潞州存在围绕“百法疏主”的民间崇拜，这也许就是长期在藏外流传的《百法忠疏》被发端于晋南的《赵城金藏》突然收入的原因所在。

建封寺中除上文两石外，另存诗刻多块，其中颇有文辞可观者，如《留题百法院》一首：“生平西辇寄萍游、万古真身向此留、通妙既能传百法、化形还复出三眸、塔光上止松斜荫、山色东横水北流、暂息清凉对灵迹、回头书简只堪羞。”署名“武陵居士王齐叟 彦龄⁵⁴”，查南宋·王灼撰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：“元祐间（1086~1094），王齐叟彦龄……每出长短句，脍炙人口，彦龄以滑稽语河朔。”同卷：“王齐叟彦龄，元祐副枢岩叟（1043~1093）⁵⁵之弟，任俊得声，初官太原，作《望江南》数十曲嘲府县同僚……。”⁵⁶但南宋范公偁《过庭录》“王彦龄有绝才”条却载其活动于宣和年间（1119~1125）⁵⁷，两书记载有所抵牾，故《全宋词》只作“不知孰是⁵⁸”。按《过庭录》载：“王齐叟彦龄，霖弟也，有绝才，九流无所不能。”考《宋史》王岩叟传，岩叟字“彦霖”，则《过庭录》之“霖”字与《碧鸡漫志》“元祐副枢岩叟”所指为同一人，那么两书所记“王齐叟”亦当为一人。岩叟为兄、北宋名臣，字彦霖；齐叟为弟、以才名世，字彦龄。如此，《过庭录》“宣和”一说，或有所误。《过庭

⁴⁸ 李富华、何梅著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，在综合分析《金藏》所存 140 余条题记后，总结道：“毫无疑问，《金藏》就是以解州天宁寺为中心，由解州所属各县及临近的长治地区、临汾地区及晋中太原府所属个别县份，也涉及毗邻的陕西个别地区的农民及其他居民共同施资雕造的。”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97 页。

⁴⁹ 《宋高僧传》卷四《唐京兆大慈恩寺义忠传》：“每一坐时，面向西北，仰视兜率天宫，冥心内院。……忽异香满室，彩云垂空，忠合掌仰视曰：‘秽弱比丘，何烦大圣躬来引接？’言尽而化。乡人道俗建塔供养，全身不坏，至今河东乡里高冈存焉。”第 77~78 页。

⁵⁰ 光绪六年（1880）李汝霖增修版《重修襄垣县志》卷四：“建封寺，在县东信村西。”现地址为长治市襄垣县古韩镇南里信村，现存地面建筑为明清时期所建，1999 年公布为长治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外，杨维中先生于《中国唯识宗通史》中亦提及此寺，不过未作展开，见同书第七章第三节，第 798 页。

⁵¹ 此文作者题名：“乡贡进士刘凤仪”，光绪增修版《重修襄垣县志》卷六：“凤仪，字天瑞，弘治庚戌（三年 1490）进士，初授高密知县……升户部主事……转升刑部员外郎，赠南京吏部尚书。”其子刘龙（1476~1554）更为杰出，同书同卷载：“刘龙，字舜卿，号紫岩，凤仪长子，弘治己未（十二年 1499）探花。初授翰林院编修……两典顺天乡试，俱称得人，升礼部侍郎……寻升南京礼部尚书，改吏部尚书。考察京职，去留允当，调兵部尚书……卒年七旬有八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安。有《紫岩集》四十八卷、《尚书讲章》八卷、《奏议》四卷行于世。”

⁵² 赵栓庆主编《三晋石刻大全·长治市襄垣县卷》著录此文。太原：三晋出版社（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），2015 年，第 106 页。

⁵³ 《三晋石刻大全·长治市襄垣县卷》著录此文。第 110 页。

⁵⁴ 此石板被镶嵌于建封寺大殿左朵殿外壁之上，楷书，纵行 7 列，作者考证见后续正文。除此之外，无余庵广润和尚作《寄赞百法疏主和尚》亦可观：“《百法明门论》、唯师疏解精、慈恩甘缩手、众友让超名、天眼通凡眼、人情彻圣情、塔留漳水岸、异国振嘉声。”广润和尚待考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云栖株宏（1535~1615）有弟子广润，俗名钱叔达，湖州长兴人，未出家时为名士，擅诗文，曾著《云栖本师行略》，但无法确证。

⁵⁵ 王岩叟，元·脱脱等撰《宋史》卷三百四十二、列传第一百一十有传，见第 10891~10897 页。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年仅十八岁即高中“三元榜首”，为官刚正不阿、直言敢谏，深得司马光等人赞许。

⁵⁶ 南宋·王灼撰、岳珍点校《碧鸡漫志校证》“各家词短长”及“王彦龄夫妇词”条，载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0 年，第 35、48 页。

⁵⁷ 南宋·范公偁撰、孔凡礼点校《过庭录》：“宣和间，上爱琵琶，博选工妙处乐府。彦龄往视工者弹拨，因默问一二，工失措，再拜就学焉。”载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·唐宋史料笔记·墨庄漫录、过庭录、可书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2 年，第 358 页。

⁵⁸ 唐圭璋编《全宋词》：“齐叟字彦龄，怀州（今河南沁阳）人。太原掾官。卒年三十九。《过庭录》云宣和时人，与《碧鸡漫志》不甚相合，未知孰是。”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358 页。同书收录王齐叟词二阙，一为《望江南》、一失调名。但江桦认为第二阙并非王齐叟所作，见同氏《〈全宋词〉所录王齐叟词考》，载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（教育科学版）》，2010 年第 6 期，第 20~22 页。

录》又记王齐叟自推命理，年止三十九，至其年果亡，预留禅颂曰：“醉魂今夜不须寻，请看武陵溪上月”，“武陵”二字需留意，上述《留题百法院》一诗署名正为“武陵居士”，《碧鸡漫志》载彦龄曾于太原任职，或于其时来游，故有理由相信此诗确为彦龄所作，而其人信仰佛教（居士），大才早亡。此诗可将建封寺（百法院）历史上溯至北宋。

再则，结合上述对《宋高僧传》的分析，对义忠地位、著作的认同及崇敬，或在北宋初年即已存在，而潞州作为其故里，此种崇敬无疑会被放大（神化）⁵⁹，延续时间也会更加久远。这就意味着，此幅精美的扉页版画以及所属文本的整体构成（玄奘至义忠之谱系），甚至有可能定型于北宋，历金、元而至明初，虽然法相一宗在神州故地早已烟消云散、衰微已极⁶⁰，然《百法忠疏》却被保留至此时而未散佚，机缘所致，又被收入《洪武南藏》。

七、《法相三祖图》之影响

《中国佛教版画全集》卷十第4~7页收有明代李贵及家族成员私刻《佛说孟兰盆经·进修仪范》一卷，纸本、经折装，长33cm、高10cm，卷首附扉页版画《佛说法图》一幅（图5）⁶¹。居中为坐姿佛说法像，身后站立二神将、身侧胁侍二弟子，再前为手持禅杖、举袖拂面、神情哀伤之大目犍连（Mahāmaudgalyayana）及恶鬼一名（或为目连之母）；画面左右两侧又有二僧凭几而坐，均附榜题，佛左者胡貌梵状、题为“疏主圭峰和尚”，右者圆面丰颐，题作“钞主广演大师”。前者指华严五祖、唐代圭峰宗密（780~841）禅师，曾著《孟兰盆经疏》二卷，故有“疏主”之谓；后者指北宋广演大师遇荣⁶²，曾撰《孟兰盆经疏孝衡钞》二卷及科文一卷，因称“钞主”。

图中二师姿态、身前几案、案上陈设、身后山水屏风等处，若与《法相三祖图》中窥基、惠沼部分相较，近似之状便可一目了然。《佛说法图》只将玄奘部分及瓶、炉除去，代之以坐佛、护法、弟子、目连等形象，以示此经主题；又将窥基、惠沼二人面貌及服装变换，但身体动态、持笔姿势仍大体维持原貌；栅足案、屏风也几如原样，且原作中为求与窥基案上陈设对称，将惠沼身前案上砚台，安置于不便实际使用的左手一侧，此图中遇荣身前几案砚台亦如此放置。总之，此幅版画主体部分虽大幅改动，但模仿《法相三祖图》之痕迹仍甚为明显（图6）。

经卷末尾附刻发愿文一则⁶³，明确记载刊刻于明英宗正统六年（1441）九月间，功德主李贵等人为“京都奉佛弟子”。按《明史》，北京虽于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正月改称“京师”，

⁵⁹ 当地有所谓“三目僧”神话，前引两诗中也有反映，如“三眸”、“天眼”等，与义忠事迹有所混同，或义忠神化后成为“三目僧”。总之，目前关于建封寺及其周边，仍缺乏基础调查，本稿暂时无法深入考察。

⁶⁰ 诚然，唐末五代之后研习慈恩章疏并未销声匿迹，竺沙雅章先生于《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》（东京：汲古书院，2000年）中有较为细致的考证（见第一章及第二章），如宋辽时期的华北地区，一直存在以此名世的僧人，且燕京、真定、开封等处亦有弘扬此学的寺院，宋室南迁后在杭州亦产生影响，持续至元代又被忽必烈用作抑制江南禅宗的手段之一。但，此处之所以如此叙述（烟消云散、衰微已极），源于笔者较为认同杨维中先生于《中国唯识宗通史》中所述观点，即唐末五代之际，“从‘法系’以及佛教‘教学’的纯粹性角度说，至此，唯识宗已经消失。延续于后世，不绝如缕的唯识经典的宣讲、弘扬，已经不再具有‘宗派’意义，而仅仅是‘唯识学’，更明确的说，这种‘唯识学’是摄论、地论、起信论的‘唯识学’。”见第七章第六节“唐末五代的唯识师”，第822页；同书“结语”部分又谓：“五代之后，尽管每朝每代都有研习、传播唯识经典的僧人及俗家弟子，但基本上可以认定，已经不属于‘宗派’性的活动了，只能称之为唯识学的延绵不绝。”第861页。当然，这仅为笔者个人短见，非敢认为绝对。

⁶¹ 《中国佛教版画全集》（翁连溪、李洪波主编，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14年）并未明言图像来源，经查，此与北京泰和嘉成拍卖公司于201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“古籍善本—最上法供养”专场中之同名拍品一致，或为其出处，或为同版所印者。然此经卷来历及现收藏者均不明，权且将此品附于文末作一简单说明，留为线索。

⁶² 遇荣生卒年不详，《赵城金藏》所收、编于北宋仁宗天圣五年（1027）的《天圣释教总录》卷下末尾，有“同编译经证义广演大师赐紫沙门臣 遇荣”名号，知其为北宋僧侣，曾参加译经及经典整理工作，有一定社会地位。再查同《藏》所收《景祐新修法宝录》卷十七，可知天圣元年（1023）三月翻译新得梵本之际，遇荣被指派为证义（“三月，以沙门惠真、遇荣、法凝、绍源并充证义”），同三年（1025）十二月赐紫（“十二月，赐证义沙门遇荣、法凝、绍源紫衣”），其“广演大师”之号或亦颁赐于天圣年间（1023~1032）。除翻经证义外，其人另有著述多种，文繁不录。上述文献可查中国图书馆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公开之《赵城金藏》清晰图片。另，北京版《中华大藏经》第72册所收《天圣释教总录》虽复制自《赵城金藏》，但卷下记载遇荣职衔一页漏印。

⁶³ 发愿文全文如下：“京都奉佛弟子李贵，同室赵氏妙秀，弟李聚，弟妇严氏妙寿，男李瓚，/上侍母亲葛氏妙真，助缘刊板，专祈：/在堂母亲寿龄绵远，福禄增崇；更翼门闾肃穆，眷爱康宁，运谋每叶于祯祥，动止常逢于吉利；更愿四恩普报，三有均资，法界怨亲，同圆种智。/正统六年九月 日。”（“/”表换行）《中国佛教版画全集》未收此文，笔者按“雅昌拍卖”网站公开之照片识读，网址为：<https://auction.arttron.net/paimai-art0026911127>。

但仁宗洪熙年间(1424~1425)计划还都金陵,复改北京为“行在”,宣宗一朝(1426~1435)暧昧处之,直至英宗正统六年十一月,即本经刊刻两月之后,北京方正式被确定为“京师”⁶⁴。然发愿文中之“京都”也并不能肯定即为南京,仁宗将北京降为“行在”,据《明仁宗实录》所记,仅限于政府部门⁶⁵。宣宗继位,阳奉阴违,北京仍为事实上之首都。如作于宣德五年(1430)的《五台山大佛光寺铸钟叙记》谓:“今有京都顺天府蓟州盘山北少林寺住持隋宝岩……。”⁶⁶铭文仍称北京为“京都”,未见“行在”二字,可见民间并未改称、仍以京师目之。再如正统五年(1440)刻《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》⁶⁷,卷末录有多条灵验记录及发愿文,“京都顺天府”或“北京顺天府”更是频繁出现。虽然如此,但笔者认为,由洪熙元年三月至正统六年十一月期间,南、北二京似均可称“京都”或“京师”,谨慎起见,在文字中缺乏“顺天府”(北京)或“应天府”(南京)字样的情况下,仅凭“京都”二字,不宜武断确定本经刊刻地点,故无法就刻经地与《洪武南藏》之关系展开讨论。但即便如此,仍可证绘制此经扉页原稿的工匠,创作时极有可能参照了《法相三祖图》⁶⁸。

八、结

本文简略分析了《洪武南藏》所收、堪称孤本的《百法忠疏》所附卷首扉页版画,即“玄奘译经图”,其画面内容显非“译经”,主旨实为“法统传承、师资血脉”,故定名为《法相三祖图》较为稳妥;结合此图与后续文本所体现的承继关系,大胆推测义忠之地位在北宋之际或应更为崇高,而智周之定位恐未如今日。然本稿绝无将义忠宣扬为法相“四祖”之意图,就中土现存史料而视,笔者反而认为对待这一问题应极为谨慎⁶⁹;此外亦关注到义忠故里潞府襄垣,至今仍存“百法疏主”的地方信仰,虽已流于神异一类,但通过对建封寺留存诗碑的分析,或可将此种信仰上推至北宋。从而亦可解释,为何在《藏》外流传的《百法忠疏》会被发起于晋南的《金藏》突然收入;《洪武南藏》经版刻成后虽然迅即被焚,但《法相三祖图》在明代前中期却并非默默无闻,其样式极有可能对个别佛教版画的创作产生了些许影响。

本稿言语粗鄙、不审之处所在多有,还望时贤不吝赐教。

文末谢辞:此文作为讨论山西省广胜下寺壁画论文之一部,曾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军教授读书会作口头发表。考虑到整体写作进度及文字总量,暂且将其单独抽出成文,广胜寺部分待完成后另行发表。本文写作过程中,央美李军教授、郑式副教授均提出过宝贵意见,在此一并致谢!

⁶⁴ 清·张廷玉等撰《明史》卷四十、志十六、地理志一:“(永乐)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。……洪熙初,仍称行在。正统六年十一月罢称行在,定为京师。”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883~884页。

⁶⁵ 见《明仁宗实录》卷八下:“(洪熙元年三月)令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(在)二字。”《明实录·明仁宗实录》册第0272页及《明仁宗实录校勘记》第140页,台北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,1962~1966年。

仁宗欲省民力,还都南京之志甚坚,《遗诏》中仍谓:“呜呼!南北供亿之劳,军民俱困,咸(属)南京,斯亦吾之素心,君国子民宜从众志。”见《明仁宗实录》卷十,0306页及《明仁宗实录校勘记》第156页。由于仁宗过早崩逝,其志未果,宣宗继位,并未实施,北京仍为事实上之首都,但政府层面名义上似乎并未正式回复“京师”之称呼,直至英宗朝方彻底解决。

⁶⁶ 张映莹、李彦主编《五台山佛光寺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0年,第258页。

⁶⁷ 藏北京智化寺,《中国佛教版画全集》卷九,第150~151页。

⁶⁸ 当然也无法排除此幅《佛说法图》所模拟者是更为古旧的版本、即《法相三祖图》祖本的可能性,因无以为证,权记于此。另外,北京文博交流馆编《智化寺藏元明清佛经版画赏析》(北京:燕山出版社,2007)刊载当寺所藏《华严原人论》及《华严原人论解》卷上扉画各一幅,亦与此图类似,将画面中部内容替换为佛说法图,两侧坐姿僧侣则仿照《法相三祖图》,但画面中未见题记。又据同书所记,这两幅版画刊印于洪熙元年(1425),还要早于正文中所述版画,但书中并未公开其年代根据或卷末题记等。故仅记录于此,不再作详细分析,两图见同书第32~34页。

⁶⁹ 原因有二,一为我国佛教界有无法相“四祖”之评定;二为传记中惠沼、义忠师徒,均存年代混乱之问题,特别是由此而来的义忠拜入惠沼门下之时间及义忠与窥基之关系,可谓众说纷纭。关于惠沼的新近考证可参看杨剑霄《唯识宗三祖惠沼生卒年考》,载《佛学研究》2018年第1期,第227~238页,本文所用惠沼生卒年仍取保守之648~714年。至于义忠,可参看杨维中《中国唯识宗通史》下册第796~797页义忠章节所作论述。虽有如上问题,但惠沼与义忠之师徒关系仍是肯定的。

图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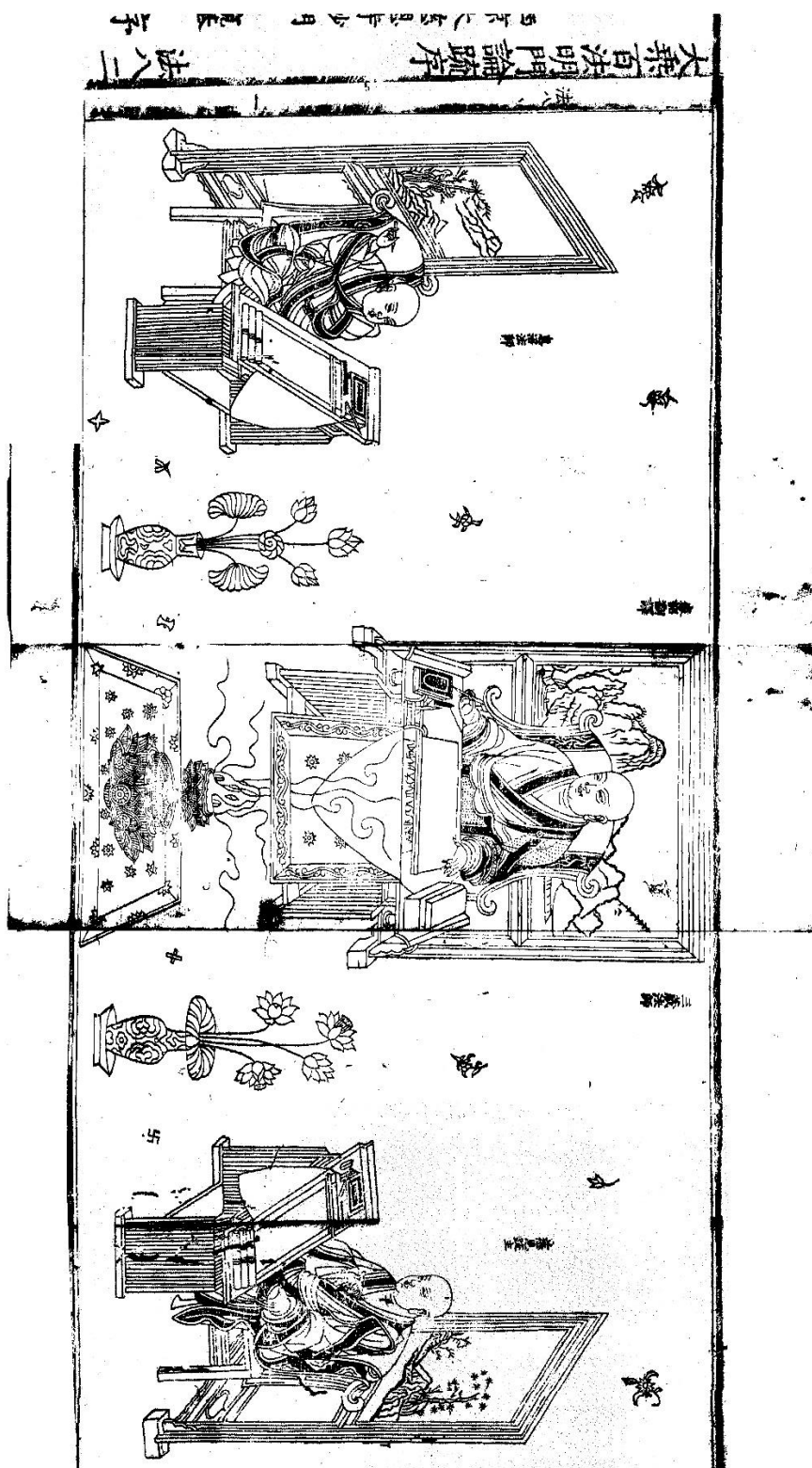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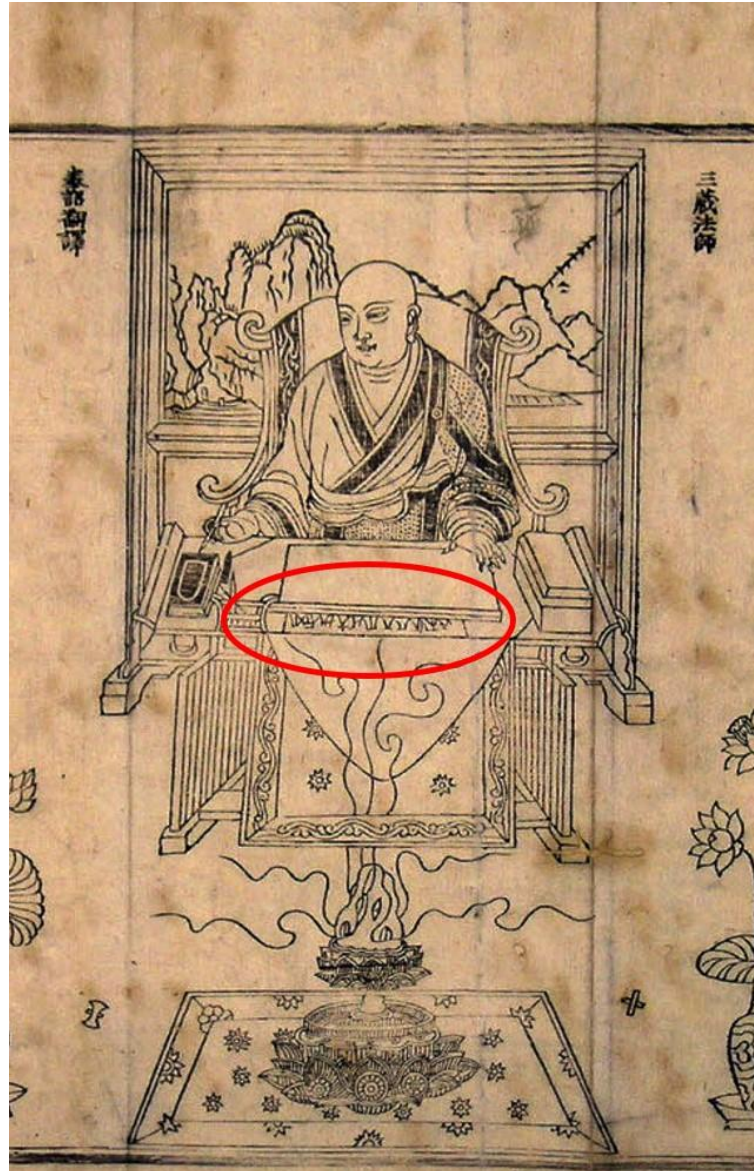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“玄奘译经图”（法相三祖图）

24×12 cm 原存四川省崇州市崇庆县上古寺 现藏四川省图书馆

《洪武南藏》（或称“初刻南藏”）“法”八、九函 唐·义忠撰《大乘百法明门论疏》（百法忠疏）卷首扉页

注：此图向无清晰图版，万不得已，笔者只得采用《中国佛教版画全集》卷五第14页所收同图窥基、惠沼部分（玄奘部分严重变形）、与四川省图书馆网站所公布者（画面中央部分）拼合加工而成。



(1)



(2)

图2 (1) 奘师案前之“梵本”贝叶经位置 (2) 局部放大(倒置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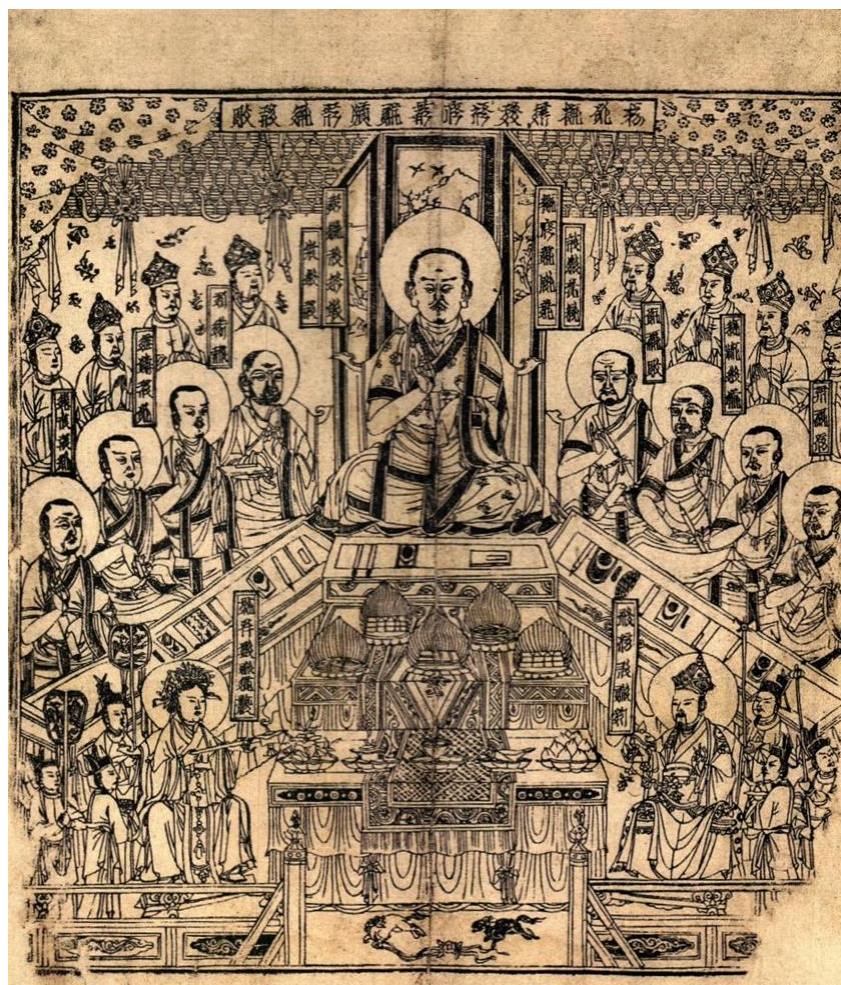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西夏译经图

27×27c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西夏文《现在贤劫千佛名经》卷首扉页

采自《中国美术分类全集·中国版画全集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年）第一卷第88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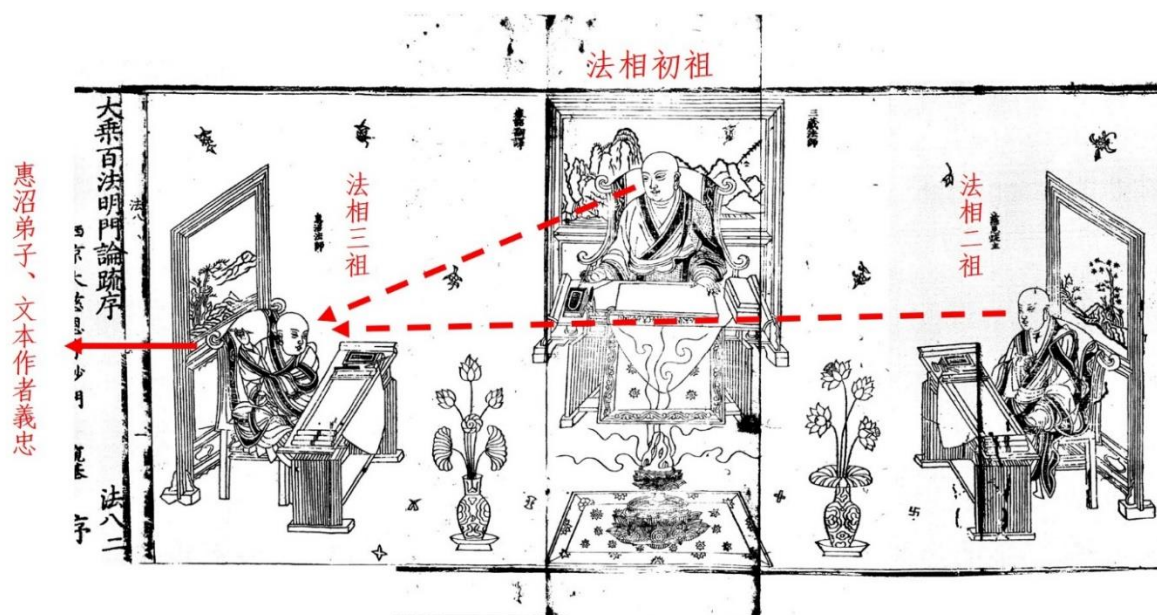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法相三祖图构图关系示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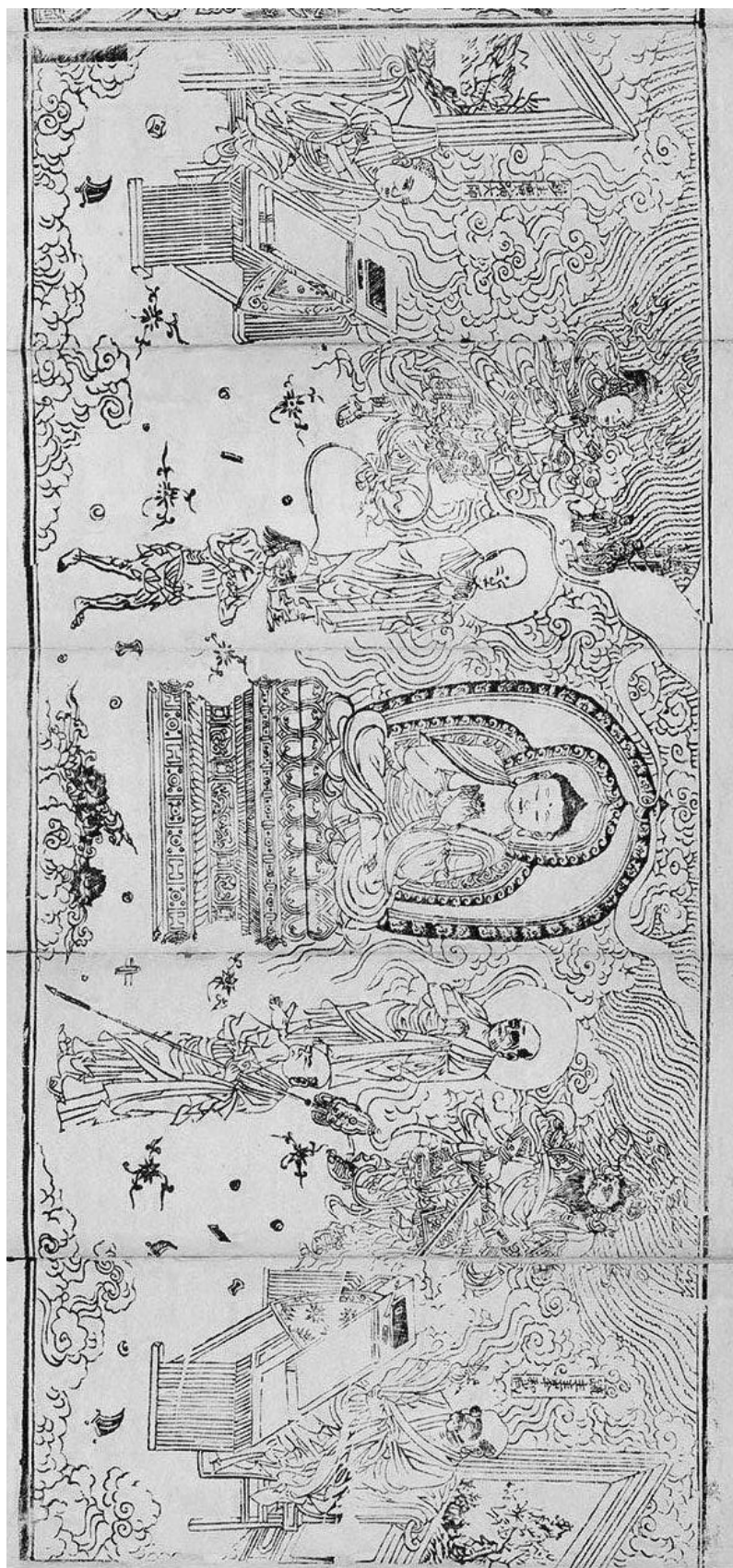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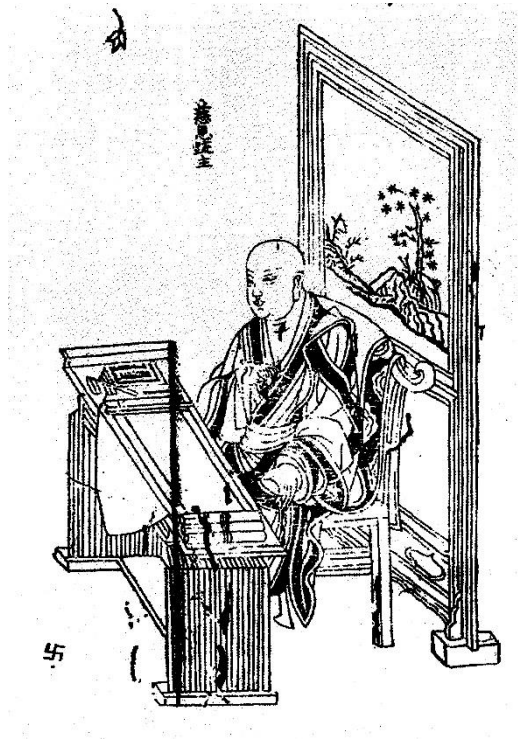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佛说法图

33×10cm (经卷整体尺寸) 明·正统六年(1441)九月刊刻《佛说盂兰盆经·进修仪范》卷首扉页
 采自“雅昌拍卖”网站公开照片



(1)



(2)

图6 《佛说法图》与《法相三祖图》局部比较